



当代文学研究

目 录

前 言.....	1
----------	---

湖北新时期文学研究

创作在于发现

——谈湖北新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

.....毛宣国 白少玉 3

在屈原的巨大根系上

——湖北新时期青年诗人创作回顾断想.....徐志祥 17

在综合治理中显现跨越态势

——对湖北文学创作现状的思考.....达流(土家族) 24

湖北新时期文学评论与研究掠影.....古远清 29

“差一个层次”差在哪里? (讨论综述).....景 昭 38

理论探讨

热浪中的沉思.....陈美兰 43

在多元发展中寻求个性的成熟

——论新时期小说语言变化的四个内在特点.....童志刚 50

论小说系统的悲剧机制与喜剧功能.....张啸虎 60

批评: 张扬与抑制的交融过程

——也谈批评主体意识的实现.....李运转 72

论文学的可读性.....江 母 78

作家谈艺录

转型梦 祖 慰 90

遥远散漫的话题

——也算谈谈《烦恼人生》 池 莉 106

喃喃独白 陈应松 111

湖北作家论

洪洋创作散论 於可训 117

新作评介

市井：全景

——读方方《白雾》、《风景》随想 乐 品 128

一个诗人的散文集

——读骆文《对人的钟爱》 田 野 132

生命的浩歌

——读王振武“关于原始社会的札记小说” 樊 星 135

不死的鹤

——张法德中篇小说《鹤》小析 尧 日 138

文坛杂感

有感于诗人写小说

——兼析我省文坛的一种现象 肖友元 142

文摘

文论新书架

后 语 144

前 言

湖北位于长江中游，这种地理位置是否给了我省文坛某种自满自足的心理安慰？然而，现实是严酷的。不“上”则“下”，“中”总是靠不住的。近年来，我省文学理论批评工作者关注着湖北文学事业的现状和发展，在忧虑不安的同时，也做了许多工作，大家都有这样一个心愿：既然生活在湖北这块土地上，为培育这块土地上的文学之花贡献自己的心血和汗水就是理所当然的。

为了接纳这些心血和汗水，我们于重重困难之中，编辑创办了这样一本文学评论刊物《当代文学研究》，希望能通过它，在作家与文学评论工作者之间、在文学与读者之间、在湖北文坛与全国文坛之间，在理论批评与创作实践之间起到沟通和交流的作用，培养文学评论人材，以推动湖北的文学理论批评发展。这是一项刚刚开始，非常稚嫩，但又充满希望的事业。它首先希望得到创作界和社会有关方面的关心和支持。创作与批评犹如车之双轮、鸟之双翼，是相辅相成，共生互补的。一个地区文学事业的繁荣，不能离开这个地区文学理论空气的活跃。

不上则下，我们别无选择。党的十三大已为我们提供了明智的选择：“必须在实际工作中鼓励探索和开拓，在理论研究上坚

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生活、实践的观点，是认识论的第一的和基本的观点。没有探索、没有创新，没有不同试验的比较和不同意见的讨论，我们的事业就没有生气。努力发扬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精神和创造活力，振奋起全民族探索创新的勇气，是我们的理论和事业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无疑，这也是我们刊物的宗旨和我们文学理论批评事业不断发展的希望所在。

展望湖北文学事业的前程，我们无须悲观。湖北创作和评论的潜力是可观的。作为伟大屈原的子孙，我们应无愧于先人和来者。这里的关键在于我们今后的扎扎实实地努力！



创作在于发现

——谈湖北新时期中短篇小说创作的几个问题

· 毛宣国 白少玉 ·

审美的眼光似乎总带有某种挑剔。这不，在为我省新时期以来小说创作的收获欣喜之余，人们总觉得我省小说创作从整体上看还不够味儿，似乎缺了点什么。缺什么呢？有的同志说，似缺少一种艺术的感觉。这话不错。我们认为更精确地说，是缺少一种艺术的发现。创作就是发现。文学应当表现对历史的发现，对人生哲理的发现，对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的发现，对艺术形式价值的发现。从这些方面来看，我省新时期的中短篇小说创作较之全国优秀之作，确有一些不足之处。因此，我们想就此作一次冒昧的发言。

(一)

所谓文学对历史的发现，是说文学在描写和反映现实时，不应只停留在对现实问题的一般关注和表现上，还应把现实看作历史链条中的一个环节，从较高层次上把握现实生活的历史渊源及未来走向，使现实与历史融为一体，从而使作品显示出更深厚的意蕴。我省不少作家关注现实，追求与生活的某种同步，这是值得肯定的。但由于缺乏历史的眼光，其结果，对现实的关注未能化为对现实的艺术把握，一些作品表现出某种急功近利，追求时效的倾向。写农村经济改革，是我省新时期小说创作的一个热

们，其中也不乏较好的作品，如楚良的《抢劫即将发生》等。但总的来看，还有待于深化。就拿楚良来说，他对新时期农村的变革和所出现的新问题十分敏感。粮食大幅度增产，国家收购不力，农民有了卖粮难的苦怨，他秉笔直书（《探求价值的人》）；土地和生产资料由集体转到个人，常发生争执和械斗，他迅即反映（《石碾，滚向何方》）。他的作品大量引进了现代生活中的最新因素：信息、流通、竞争、智力开发等，不少人物象马腊腊、诸葛光等都具有改革意识和魄力，商品经济观念强，勇于开拓，是所谓农村的新人代表。这些生活中的新因素、新人物涌进作品，确实给文坛带来了一些清新之气。但作品的意义似乎也就停留在这里，无论是提出问题的方式还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显得单一和表面化，缺乏引人深思的历史感悟和耐人寻味的艺术韵味，所以在引起一时的轰动之后，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的价值便逐步递减以致归于沉寂。

我省小说家们所写的题材不少是自己所经历过的生活。无论是楚良笔下江汉平原的改革者们，映泉笔下饱受苦难和不幸的山区娘儿们，还是叶明山笔下的兰湖、鹅湖山的水乡妹子，方方笔下的武汉胡同巷子里的哥儿们，均与作者的身世经历有某种联系。有一定的生活阅历，对作家创作是重要的，但若囿于个人的生活经验，不能以深邃的历史眼光和艺术家应有的审美方式来体察生活、透视生活，同样写不出优秀之作来。映泉自称他的创作是一种“驴子似的具体发现”，他写以“桃花湾”为背景的几个系列中篇，是因为“在严厉打击拐卖妇女儿童的人贩子的时候，我发现了女人自找人贩子的现象，在大力宣传婚姻法、反对媒妁之言、号召恋爱自由，婚姻自主的地方，我却看见那里的婚嫁仍得求助于媒人；男女平等上了法律条文，山区分家却没有姑娘的份儿……”^①。由于尊重这种“具体发现”，尊重自己所经历的生活事实，作家忠实地再现了桃花湾娘儿们的苦难，不幸，也正

是由于执着于这种具体发现，作家未能跳出自己的经验范围，以更深远的历史意识和艺术眼光对桃花湾妇女的命运作深刻的反思，而是以一种线性因果律的思考方式，把桃花湾妇女的苦难归结为山区的经济落后，似乎只要山区经济发展了，妇女的命运就会改变。事实上，造成人生悲剧的因素总是多方面的，中国当代农村妇女的这种命运状况及其出路，涉及现实和历史的各个角落，改变她们的命运需要有一场从政治经济体制到社会习俗、文化心理结构的大变革。这一题材应可提供更多发人深省的历史和当代启示录，所以我们在肯定映泉的发现时还不能不带有某种意犹未尽的心情。方方也很珍惜自己的生活经验，她早期作品中所写的人物往往与其经历形影相随。也许正是由于她那几年装卸工的生活，她对社会地位卑微的人抱有强烈的同情心，对他们的自尊与自卑的心理异常敏感，对社会的等级意识和门第观念本能反感。作品表现出作家这种主观情感倾向和现实感喟，确也蕴含着令人寻味的社会内容，反映出某种现实社会心理。但早期的方方尚缺乏对现实的历史超越，作者的心理郁积得不到渲泄，对自己笔下的小人物给予过多的同情和赞美，甚至自己也被作品中的人物所同化，这就使读者不能不感到作家的胸怀尚欠博大，气度尚乏雍容。作家珍重自己的生活经验，无疑值得肯定，但文学决不能停留在经验的世界中。艺术地表现和把握生活，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要跳出个人狭小的经验天地，不为沉重的身世感所束缚，不为特定的题材所局限，而应超越生活和题材，以自己独特的审美方式和历史眼光重新评价、选择和组合生活，让生活内核中的历史积淀呈现出来。

小说家力图通过对生活的同步反映来展示现实感和当代意识，这种愿望无疑是好的。但是对现实感和当代意识不能作狭隘的经验式的理解。审美意义上的现实感和当代意识决不只是现实生活的同步追随，更重要的是一种时代风貌，是一种被时代所推

崇的总体气概，是包含着昨天、今天和未来的审美感悟和观照。唯有这样，艺术家才不致使自己的作品昙花一现，仅仅成为昨天的注脚。《乔厂长上任记》、《班主任》固然具有强烈的当代意识和现实感，但务实入世，直接干预生活并非就是当代意识的唯一表现形式和全部内容。在当今中国小说界，有这样一种现象，一些似乎离现实较远的作品反倒具有更强烈的当代意识。《黑骏马》那悠长的历史回声，《爸爸爸》那深沉的历史感悟，都把人们引进历史、带回现实又面对将来。路遥的《人生》则是写现实问题而富于现实感和历史感的小说，这表现在它不仅写出了在中国当前的城乡经济、文化巨大差异的现实面前，象高加林这样有才华有抱负的农村青年往往被埋没，其人生追求往往难以实现，而且揭示了这种现实的不合理性，展示出历史发展的某种趋势。作品把高加林的个人命运作为古老的生活方式向现代生活方式转变的一面镜子，写出了这种历史运动的不可逆转性。由此可见，我国当代的优秀小说，无论是否直接反映现实，都在走向现实与历史的交融，是现实生活的历史发现，也是历史发现的现实升华。苏联美学家鲍列夫认为艺术中存在三种尺度：过去、现在和将来，艺术家即面向他自己的社会环境，面向同时代人，又面向遥远的未来人，面向整个人类。艺术家努力介入今天的关系，同时又力图切断当代的界限，把自己时代的经验用于未来，用永恒的全人类价值来衡量当代。进入到审美层次的作品必须做到过去、现在与未来的结合，否则就不能使作品在本体论意义上富有长久的魅力。^②值得高兴的是，现在我们已经拥有了象池莉的《烦恼人生》、方方的《风景》等佳作，它们标志着我省作家在揭示现实生活的深度上达到了一个新的境界。在印象厚（《烦恼人生》）和“我”这一家子（《风景》）身上凝聚了我们的现实环境、民族心态和生态及历史渊源的许多方面，“我们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作品朴素的现实描绘中蕴藏了深厚的历史

意味，激起读者的强烈共鸣和持久思索。因此，我们有充分的信心期待我省小说创作在这一方面的整体性突破。

(二)

文学创作的审美发现也是人生哲理的发现。钱学森同志曾指出，最高层次的文学是富于哲理意味的。文学向哲学层次的展开，是当前中国小说创作的一个发展趋向。无论是都市文学还是乡土文学都在哲学意识的强化过程中，把自身送到一个更高的审美层次。哲理趋势也是二十世纪文化—精神形势的特征。文学向哲学靠拢，是艺术发展的必然。艺术不只是一种表层的形象，更重要的是形象蕴含的深层意味。这种意味一般又分为两个层次，浅层次是习俗的、某类人的、某个地域特有的意味，深层次则是全人类全民族共有的某种文化心理的哲学精神。中国当代有成就的作家，均善于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文化哲学、西方人本哲学和科学哲学那里吸取养料。哲学意识常常唤醒艺术家的创造精神，推动他们进行敏锐深刻的观察，形成更广阔的艺术视野和更开放的艺术思维。哲学意识的强化是创作主体意识强化的一种表现。这里所说的哲学意识，不是指作家通过作品表现出某种哲学观点，或作品蕴含着某个哲学道理，而主要是指一种理性洞察力，一种感悟世界，透视人生的思维方式，它能导致从作品的具体描写中激起对整个人类生活、命运的强烈关注。因此，富有哲理性的作品也就是具有巨大思想容量的作品。

我省小说创作写现实、写改革，之所以往往囿于个人生活的圈子，不能突破某种固定的政治、经济、道德模式，不能超越题材而为题材所限，哲学意识的欠缺是非常重要的原因。我省有些小说家尚局限于情节的编撰和对现实问题的平面反映，作品的容量十分有限，很难让人透过作品对生活作进一步的思考，更不用说引导读者超越具象的描绘、领悟某些普遍的哲理。当然，我省

不少作家也并不满足于一般地描写现实，他们力图对生活进行某种哲理升华；给读者一定的人生启示。祖慰是一个自觉追求哲理意识的作家。《矮的升华》通过一个有先天生理缺陷的舞蹈天才不断追求，最终获得成功的人生道路的描写，告诉人们这样一个哲理：人的价值就存在于不懈地追求之中，存在于个体的努力奋斗和自我完善之中。《心有灵犀的男孩》写一个有特异功能的男孩，因为他能识透人心的隐秘，便引起人们对他的恐惧和仇视，成为不受欢迎的孤独者。作品隐藏着这样的寓意：现实社会中人与人心灵沟通的不易，方方也是有心追求哲理意味的。《江那一岸》写一位少女对江对岸美景的憧憬，而一旦身临其境，反觉平淡无奇。作品似乎企图揭示这样一个道理：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是人生的永恒矛盾，人们总是追求理想而对现实不满。但是，从总体上看，我省新时期小说中的哲理光照一般是单线条的，缺乏辐射，给人们的多是生活的某一个点上的哲理暗示，难以形成从宏观整体来把握世界的人生感悟。有的作品还表现出某种为哲理而哲理的倾向，甚至离开艺术形象人为地进行哲理升华。中篇小说《十八岁进行曲》应当说是一部较好的作品，作者敏锐地抓住了人生的一个奇妙的年龄阶段。抓住这个年龄阶段，写青年人对未来、对现实、对他人、对自我的种种认识，这无疑可以揭示出极为丰富的生活哲理。可惜作者尚未能赋予作品的人生感受以更具普遍性的品格，作品中人物的感叹，困惑，不满，追求，几乎都与某种特定的社会心理（如对等级意识，门第观念的愤懑）直接相联，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作品内蕴的丰富性，不能留给读者更多的回味与思考；作品力图揭示的较丰富的人生哲理也只能由作者在小说结尾直接点明了。祖慰的作品理性观念很强，但也显得有些抽象化，哲理与生活 and 形象的交融尚欠自然。文学作品中的哲理表现，应当具有文学的特征，它是一种丰富复杂，一下子道不明，但又令人时时感到其存在的“意味”，带着强烈的体验

性，扩散、弥漫在整个作品之中，任读者从不同的角度看，都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迪。着意扣住一点去进行哲学的加工、理性的升华，往往会弄得过于直露和明白，从而导致肤浅和生硬。试观国内一些优秀之作，如《没有纽扣的红衬衫》、《今夜有暴风雪》、《棋王》等等，作品似乎并未摆出某种刻意追求哲理意识的架势，却仍给读者以远远超过作品具体题材的深长的理性回味，其中的奥妙，是值得我们思索的。

(三)

“文学史，就其最深刻的意义而言，是一种心理学，研究人的灵魂，是灵魂的历史”。^③文学的发现，就其最深刻的意义而言，也便是人的灵魂的发现，是人的复杂内心世界的发现。总的看来，我省的小说创作似乎还不善于表现人的复杂情感意识，探寻人的内心世界的无穷的差异性和丰富性。人物形象往往只是呈现出某种单一的情感状态，而未能构成一个充满矛盾的心理实体。一九八三年以前的一些作品，例如《第九个售货亭》、《沃土》、《大蓬车上》、《美人儿》、《同船过渡》等，着力刻画的是人性善的一面，写的是人间的温暖与友情。近几年来，社会的急速变革使人们意识到社会历史并不是想象中的那般温情脉脉，历史的进步常常不是靠“善”而是靠“恶”来实现的。在社会大变革的今天，一切传统的道德意识、价值观念几乎都被置于被告席上。善恶并举、美丑泯灭，人们似乎失去了选择的标尺。历史处处充满了二律背反，“技术的胜利，似乎是以道德的败坏为代价换来的^④”。现代社会，人道主义的旗帜在理论上比任何时候都更高地举起，可现实的人却更多地屈从于机械和技术而失去作为人的主体自由感。过去，我们象是从遥远的天国审视西方现代文明的悲剧命运，弹指间，这也成为我们当今所面临的严峻现实问题。作家们困惑、震惊了，方方觉得自己早期作品那浪漫的

色彩在现实面前是多么灰暗，她不再呼吁人们相互关心和理解，而是写对往事的惆怅和感伤，写失落、写失望，写对人生无法理解的感叹（《冬天的事》、《江那一岸》、《司机秦大宝》^⑤）。明朗变成了迷茫，轻松变成了沉重，单纯不再复存在，人生面临新的选择（《夏天过去了》、《十八岁进行曲》）。作家们不再一味写人之善，而着力于揭人之恶。（叶明山《拉网村最后一匹公狗》；喻杉、明达《重阳舅的树，重阳树》、楚良《女人国的污染报告》）。有这么一批人，在人生旅途上春风得意，可另有一批人，连笑声也充满苦涩。劳动、工作、恋爱婚姻均成了沉重的包袱。他们在苦痛中追求，在发泄中享乐。“义”“利”之争（楚良《蚂蚁与珊瑚》）现在变成了明辨“义德”本身（楚良《对第三者的审判》）。牺牲自己、关心他人未必能带来他人的快乐。生活太多苦涩味，各人都只能默默地咀嚼自己所收获的怪味果实。（祖慰《冬夏春的复调》）但无论是写人之善还是掘人之恶，无论是写人的欢乐还是人的忧郁，我省作品大多停留在外在世界而未进入人的内心视境，作家还不善于从人物表层心理进入人物深层心理，展示人的多样化的情感运动，目光尚习于趋于一极而缺乏辩证流转。

从外在世界进入人的内心视境，也就是审美主体从审美对象身上找到一个心灵的对应点。审美主体不是外在地感受现实，而是要以艺术家主体的人格精神去同化现实，升华现实。我省有不少写传统道德和现代生活方式冲突的作品，作家们注意到处于这种冲突中的人的价值选择，企图从中挖掘某种人性意味来，但人们读来总觉得肤浅。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它们只写出了人的外在行动，没有解剖人的内在灵魂，作品更多地表现了作家的社会伦理评价，而不是审美的选择。例如《重阳舅的树，重阳树》，写一个在致富过程中丧失人性的万元户，企图通过这个人物来探寻当前农村的道德、人性的变移，但作品只是写出了这个人物一

系列惨无人道的行为，却未深入人物的内心世界，人们看到的是这个人物在做什么，而不知道他为什么这样做。作品没有涉及社会大变革背景下人物复杂矛盾的心理。人的价值选择中的情感矛盾和惶惑，而是以某种社会道德标准作了直接了当的伦理裁决。如果以这一作品与《鲁班的子孙》比较，更可看出问题。《鲁班的子孙》的作者尽管也有自己的伦理倾向，但他并不直接充当裁判官。他描写的是现代生活观念与传统道德冲突所引起的复杂的心理冲突，表现的是人物心灵深处情感的撞击。我们体验老木匠那种对人生的叹息和感慨，那种惋惜和莫可奈何的心理，不禁也涌起一种难言之思。我们满腹狐疑地注视着那个以大胆变革的精神和精明的手段赚钱致富后又变得自私的小木匠，猜不透他将来的路究竟会如何走。于是我们掩上书卷，脑中就会浮现出人性与历史、社会变革与世道人心等思索不尽的永恒命题，仿佛到多种类型的人们的灵魂中去游历了一番，更加深了对人的认识和理解。楚良的《对第三者的审判》也是写现代意识与传统道德冲突的，作品企图塑造一个具有个性自由、执着追求爱情、挣脱一切现存的法律和道德束缚的新时代女性形象，并通过对她的赞美和对传统道德的批判，以激起人们对当前社会婚姻和道德关系的思考。慕容华插足他人家庭，不是为了情欲，而是为了得到她神圣纯洁的爱。她把法庭变成向众人宣讲自己爱情观的讲坛：“我也是妇女，我们有爱的权利！”“没有爱情的婚姻才是不道德的，我们爱！”但由于只停留在外在行动的描写上，未写出人物的复杂情感活动，读者便觉得这种宣讲十分无力。女主人公向社会，向传统挑战的勇气和行为足可令人瞠目，但这个人物却没有自己的内在灵魂，只是寄寓着作者某种观念的躯壳。在现存的婚姻关系和道德面前，象慕容华那样追求爱情该要承受多么沉重的心灵痛苦，有着多么复杂的心灵历程，可是作家全然不顾。张洁《爱，是不能忘记的》，所写题材与楚良此作相似，但女主人公的情感

历程、心灵的矛盾运动则历历在目。她有自己的爱，但又无法冲破道德藩篱，去实现自己的爱。无限哀婉之情，深深震撼着读者。艺术正是应当这样使人看到人的灵魂的最深沉和最多样化的运动，它所展示的不是单一的情感憎恶，而是复杂情感的动态过程，是人类普遍的欢乐与悲伤，希望与绝望、热恋与憎恶的对立两极在主体精神上的凝聚。这里深藏着艺术的奥秘，而要把握奥秘总要经过艰苦的努力。

人的内心世界的矛盾运动根源于外部现实的复杂矛盾。普列汉诺夫说得好：“个别人物心灵中发生的过程乃是历史运动的反映。”只有对人的灵魂的对复杂内心世界的揭示，方可能使作品对社会历史、人生哲理的发现和揭示显示出作为人学的文学深度。对人的灵魂和内心世界的发现决不只停留在个体本身，必然包含着丰富的社会人生内容。高加林那动荡不安的灵魂搏斗，那高尚而又卑下的情感世界，正凝聚了我们这个社会现实中的种种矛盾，这个人物的人性表现现象一面镜子，反照出了形成这种个体性格的现实矛盾运动。小说创作若缺少了对人物的这种心灵辩证法的揭示，读者是很难从中体会出多少深厚的含蕴来。

(四)

文学的发现也是文学形式的发现，是文学形式自身审美价值的确证。小说形式的创新和富于艺术个性的发现确实给当今中国小说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小说创作日呈新貌。叙事模式、叙事视角的转换，情节的淡化、诗化，人物性格的弱化，环境、背景的超具象描写，向氛围或情调的转化，语言的隐喻和象征意味的强化，叙事时间和心理时间的交融，实在空间和意象空间的统一，荒诞、幽默、哲理讽喻手法的运用，无意识、下意识、梦幻意识的渗入，等等，为当今小说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前景。我省有些小说家也注意到了这种变化，他们在自己的创作中也进行着形式

的探索。

祖慰在国内说来也算得上是最早自觉探索形式变革的小说家之一，他在小说形式方面作了大胆的实验，几乎每写一篇新作便尝试一种新的格局、结构和手法。他创造了平行阅读法（《惊人的平行》），间断、跳跃、第三者插入的对话法（《新体验咖啡馆的经理》），结构的音乐化（《冬夏春的复调》），电影化（《爱神相似定理》），几何化（《被礁石划破的水流》），甚至还尝试以控制论的黑箱方法来组织小说结构（《进入螺旋的比翼鸟》），方方则喜用象征手法，她的许多作品的篇名如《江那一岸》，《看不见的地平线》、《墙》、《栅栏》、《风景》等等，本身就是一种隐喻，象征。近期出现的陈应松的《黑藻》在象征手法的运用上尤可一提。那在阴雨中飘泊的难以修复的破船，那巨大的缠住人缠住世界的黑森森的水藻，从总体上象征了我们曾经度过的那一段阴暗、愚昧的生活和人人都拖曳着的难以摆脱的历史重负，从而极大地扩充了作品的艺术容量，使一个老而又老的故事载起了丰富而沉重的人生思索。追求小说的诗化，是叶明山自觉的美学意识。他认为小说的诗意追求可以淡化情节，“把单线变成光芒四射的幅射线，让写实的表层的现实生活和人生信息在诗歌的音响轰鸣中，成为感悟、追求”^⑥。但是，我们觉得有些形式探索还难说是成功的，有时表现出为形式而形式，违背小说的文学性要求，过于注重感受的抽象化和形式的新异，而忽视艺术特有的审美情趣的倾向；不少作家尚未能找到能够充分发挥自己艺术创造潜力，具有独特审美价值的形式。更值得注意的是，还有相当多的小说家对艺术形式的创造似乎表现出一种漠视的态度。同全国发展变化的小说形式相比，我省小说的叙事模式、体例结构、人物语言、表现技巧都相对的单调划一。从叙事角度来考察，我省作家基本是以社会为主要视角，而当今国内小说界不少人已从考察人的社会命运转向考察人的精神现象和文化心理，

基本视角在由社会向心理方面转化。在叙事方式上，我省作家还是多袭用传统的“全知全能”的模式，还不太习惯使用新的叙事手法。小说家们仍是习用世人的常态眼光感知现实，而在今日中国小说界，非常态的现实感知作品已大量涌现（如《透明的红萝卜》，残雪《山上的小屋》、林斤澜《矮凳桥小品》等）。实质上这是一个如何找到属于自己独有的艺术感觉的重要问题。在突破传统意义的人物塑造和性格描绘方面，我省作家有一定的自觉意识。祖慰的不少小说基本上没有什么性格描绘，叶明山着意诗情渲染，方方的许多作品意在表现某种意绪和感情的历程。但从总体上看，如何广泛借鉴非写实小说的形式技巧，以有利于人物心理的深层描绘和审美化展示，有助于扩充作品的艺术容量，这一点正是我省小说创作中的一个薄弱之处。语言运用路子不宽也是我省小说创作的一个弱点。我省小说的语言运用基本上还停留在拟声拟形，描摹写实阶段，较少隐喻和象征、缺乏暗示。其实，文学语言主要功用不在于描摹指称事物，而在于表现意蕴。文学语言应是高度内涵的，“充满着历史上的事件、记忆和联想”。因此隐喻和象征已成为现代文学语言不可缺少的特征。在语言风格上，我省作家尚偏于单一化，多为传统的清新、典雅、洒脱、风趣，而缺乏粗犷豪骏、朴拙俚俗，苍老木讷、沉着老辣等多样化的语言风格。文学是语言的艺术，对文学语言的审美功能的发现，常常是形式创新的焦点。

对形式的审美发现，也是艺术家对主体精神、创造能力的发现。形式问题并非一个纯形式问题，它积淀着人类文化、社会人心的历史，是艺术家主体精神的外化。玛格丽特·农伯格认为，现代艺术家“目前正在对忧虑的时代的压力和威胁作出反应，因此我们就必须考虑现代艺术怎样运用象征手法和为什么要用象征手法来表现他的内心世界”。因此，形式、手法等等，都是作家感受世界和再造世界的独特方式，形式的选择和变革意味着精神